

元玄教宗師張留孫年表并序

顧 敦 錄

張留孫不但是元代道教傑見的出道士，也是整個道教史中屈指可數的偉大人物。天師道以一劍一印傳世，有修道不忘政治的傳統。張留孫比當時的嗣漢天師張宗演、更能代表這個傳統。無怪元世祖要‘任命’他取而代之了。張留孫兩次挽救道教有史以來的大危機和對於道教一般的貢獻，已詳拙著讀孫克寬教授著元代道教之發展（孫著簡稱元道教）。張留孫對於元代五主四十七年政治上的貢獻，當另撰張留孫與元初政治一文發表，茲不贅述。現在略述本年表所用的資料。

本年表所用的資料，除正史、集部、孫著元道教和元代文化之活動，以及普通工具書以外，主要的，是以虞集袁桷趙孟頫三人關於張留孫的碑傳編織而成。三人與張留孫同時同朝，相知最深。所以他們的文章是最可靠的材料。虞袁二氏的文章各見本集，尚易見到。趙孟頫的大元勅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碑銘并序（簡稱趙著張碑），是一篇應該特別說明的文章。

爲什麼趙著張碑須再說明？第一、這是奉旨撰書的碑銘，當然比虞袁二氏私家的文字更爲重要。第二、趙著張碑所記也比較的詳細。凡後者所有的、前者無不有之（只有一個例外，袁文有解救崔彧事而趙文無之）。而前者所有的、後者間或無之。例如成宗與張留孫關於‘老君睡、覺’的問答，張留孫七十畫像贊全文，以及張留孫臨終遺言的內容等，後者均付缺如。第三、趙孟頫撰這篇碑文的時候，觸景生情，借題發揮，把死了的張留孫與自己的活生世，併作一談，縱情傾瀉，波瀾翻騰，在墓誌碑傳中別開生面。

第四、趙著張碑不見松雪齋集，是一篇不易見到的文章。近來研究趙氏文章和元代道教的人，多以未得一讀爲憾。今夏我偶爾好奇在東海大學同事陳永森先生的收藏中，發現趙氏此文，竟是碑拓本兩大張，各縱十英尺二寸，橫四英尺十一寸，每字約一英寸半見方。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亟以持告孫今生教授，奇文共賞。年表遂據以完稿，且引用獨多。

世人多不知張留孫是何許人。知道了的，也多不知道張留孫的碑會立在北平東嶽廟，因爲該廟自有虞集撰的東嶽廟神聖宮碑（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三）。張留孫的碑，那裡會立進東嶽廟？但張留孫與北平的東嶽廟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所以該廟兩座重要的碑中，其一即趙孟頫撰書的張留孫碑。事詳年表末節。（頁27。）

但這座碑另有一個問題，就是不見於松雪齋集。其實這也不成問題，因爲趙孟頫的集外文很多，這篇也是其中之一。我曾請教金石專家丁念先先生。據丁先生說：‘這文是趙著無疑。陸心源雖疑爲趙仲穆作品，以爲立碑是在天歷二年（一三二九），而趙孟頫在至治二年（一三二三）已經去世了。殊不知碑銘儘可是先行撰書，留待後來刻石立碑的。

丁先生的解說是很通的，因為張留孫在至治元年十二月逝世，而趙孟頫在至治二年六月以前把碑銘撰書完成，以時間而論，是完全可能的。或者正文是松雪道人的親筆，文後立石一行是趙仲穆補書，亦未可知。因為奉旨的「差使」是不可怠慢的。無論如何，這篇有多方面價值的文章，亟須廣為流傳。何況現在所借得的碑拓本更是書文雙絕的海外孤本。用特全部影印，並放大原拓本數字（1. 趙著張碑正文一句和2. 趙著張碑立石年月數字）與（3）故宮博物院藏趙書蘇軾西湖詩（4）和家藏趙撰書隆興寺金剛上師膽巴之碑帖數字，附刊于下，以備同好的欣賞、比較、和鑑定。

五十七年聖誕節，于東海大學之松韻軒。



4. 顧敦鈔藏趙撰書隆興寺金剛上師膽巴之碑帖，詳頁27



3. 故宮博物院藏趙書蘇軾西湖詩



2. 趙著張碑立石年月



1. 趙著張碑正文一句

元玄教宗師張留孫年表

宋理宗淳祐七年（公元一二四七）生。

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一三二一）卒。

曾祖宏綱

祖粹夫

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使司事。

宋理宗淳祐七年（一二四七）生一歲。

元勅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留孫，字師漢，生于江西信州之貴溪。

‘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額美鬚髯，音吐如洪鐘。’（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五十，張宗師墓誌銘。簡稱虞著張誌。）‘兄聞詩學道龍虎山，（公）見而慕之，遂服道士服。以漢天師所傳授，游江淮間，……咸願受其說。’（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有元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家傳，簡稱袁著張傳。）‘有相者過之曰：異哉貴人！七分神仙，三分宰輔也。’（趙著張碑。）

是年蒙古定宗伐高麗。

寶祐二年（一二五四）七歲。

趙孟頫生（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年六十九歲）。

開慶元年（一二五九）十二歲。

蒙古軍南侵，忽必烈自武昌間使通問張天師。‘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日盛，來居信（州）之龍虎山。’（元史列傳卷八十九，釋老傳，張宗演傳。簡稱元史張傳。）

蒙古憲宗殁于軍。賈似道乞和，鄂州圍解。

明年蒙古世祖忽必烈即位于上都（開平，在今察哈爾省多倫縣東南）。以八思巴爲國師；行交鈔法。再過四年（一二六四）蒙古世祖入都于燕（北平），改元至元。

度宗咸淳二年（一二六六）十九歲。

袁桷生（一二六六——一三二七）。

咸淳四年（一二六八）二十一歲。

公弟子吳全節生于江西饒州之安仁。後襲玄教第二代大宗師。（一二六八——一三四六。年七十八歲。）

咸淳七年（一二七一）二十四歲。

蒙古入寇；改國號曰元。

咸淳八年（一二七二）二十五歲。

虞集生（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年七十八歲）。或謂咸淳六年生，誤。

次年襄陽降于元。

恭帝德祐二年（一二七六）二十九歲。

是年即蒙古世祖至元十三年，伯顏入臨安（杭州），擄恭帝北去，南宋亡。

‘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嗣漢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按即宋理宗開慶元年。），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于今矣。”’（元史張傳。）¹

宗演弟子張留孫等數十人隨行入見。‘上（世祖）獨目公（留孫）而偉之。’（趙著張碑。）公弟子夏文泳生于江西信州貴溪縣之唐甸。後襲玄教第三代大宗師。（黃涓金華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翊運大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事，集賢院道教事，夏公神道碑。簡稱黃著夏碑。）

上一年，馬可波羅至元上都，謁世祖。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三十歲。

‘十四年春正月……宗演回江南，以其弟子張留孫留京師。’（元史世祖本紀，簡稱世祖本紀。）‘上時時召問。’（趙著張碑）

黃縉生（一二七七——一三五七。年八十一歲。）

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三十一歲。

元軍執文天祥，囚五年，殺之。宋恢復勢力消滅。

‘至元十五年……五月……制授張留孫江南諸路道教都提點……七月……建漢祖天師正一祠于京城……九月……正一祠成，詔張留孫居之。（世祖本紀）按正一祠後稱崇真宮。一說，築于至元十四年。

‘十五年加玄教宗師，授道教都提點，管領江北淮東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銀印。’（袁著張傳。按元史、新元史張傳，附張留孫傳（簡稱新元史本傳）及虞著張誌，所載略同。）

從這時起，留孫在元廷大受尊寵。特別可以注意的，是在為皇太子皇后祈禱療病靈驗之後，²要給以天師的尊號。但張留孫說：‘天師有世嗣，臣不可稱天師。’（趙著張碑）于是仍以張宗演為天師，而先授留孫以‘上卿’的尊號，賜尚方寶劍，再授‘玄教宗師’的尊號，賜銀印。兩京各建崇真宮，賜園田使居掌祠事，在道教中另成一派。澤及家屬門人。行幸無所不從。這許多優遇都是至元十四至十八年間的事。³

1 元史（列傳卷八十九，釋老傳，張宗演傳。）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二，列傳第一百四十四，釋老傳，張宗演傳。簡稱新元史張傳。）所記全同。惟趙著張碑記：‘歲己未，世祖軍武昌，已開嗣漢天師張宗演名，問使通問。’是元世祖己未通問者，有為張宗演，抑為張宗演之父之二歧說矣。趙孟頫為當時人，豈暮年誤憶耶？

2 兩元史記張留孫為皇后却病解夢事，較趙著張碑及其他傳誌文為詳。錄之如下：（元世祖）‘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按新元史無‘取所事’三字。）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新元史無‘后’字）（元史新元史本傳。）

3 這個關係重大的天師問題，迄未能考定其發生的年份。我們只知道發生在張留孫為皇后在日月山祈禱醫病之後的當年或第二年春天。但查不出元世祖和皇后這一次是什麼時候上日月山的。皇后是在至元十八年二月崩的（新元史卷一百四，列傳第一。），所以只能說是十四、十五年間的事。將另撰一文討論之。

連帶可以把后崩的年份略加討論。元史所載，歧為兩個年份。一個是至元‘十四年二月崩’。（卷一百十四，列傳卷第一，后妃一，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傳。）這是不對的，因為這年春天，正可能是應驗張留孫的‘預言’，后病痊愈的當口。后若于這時崩，蒙古人就不會當張留孫是神仙了。‘四’字可能是‘八’字草書之誤。第二個年份是‘十八年正月……崩’。（卷一百十五，列傳第二，裕宗傳。）這是對的。新元史裕宗傳避提后崩年份，而只有上提后傳所載一個年份，所以不發生歧異問題。但與元史裕宗傳所載后崩的時間，有一個月之差，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三十二歲。

元軍陷厓山，宋帝昀溺海。

命宗師張留孫即行宮作醮事。

‘明年（十六年）奏復宮觀，令自別爲籍。有獻言者，道藏經多殺雜，宜焚去不錄。（留孫）遂密啓裕宗：“黃老書漢帝遵守清淨，嘗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願殿下敷奏。”後上大悟，召翰林集賢議定上章祠祭等儀注，訖行于世。’（袁著張傳。）元朝的佛道之爭、這時已經開始，到至元十八年而成爲高潮，吵吵鬧鬧，一直到二十五年。在表面、首當其衝，弄得焦頭爛額的是張宗演。在幕後制于機先，婉轉密諫，挽狂瀾于既倒的是張留孫。本節所記，賅括十六年至廿五年間事。

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三十三歲。

‘奉詔祠名山川，給驛馬五十，令訪遺逸以進……回朝以所見聞刻于上，上悉用之。（袁著張傳。）後七年，程鉅夫亦奉詔訪江南。

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三十四歲。

（至元）‘十八年七月，皇曾孫生，是爲武宗。上（世祖）名擇嘉名以進。是歲分翰林集賢院爲兩。道教專掌集賢，始自公（張留孫）議。’（袁著張傳。）按翰林集賢分爲兩院，元史百官志謂係二十二年事。詳後至元二十二年條。復出待考。

嗣漢天師張宗演入覲。命設醮于上都壽寧宮。‘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尙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嗟嘆久之。”’（元史張傳。）⁴

‘至元辨僞’事起，詔焚道家書。

吳全節十三歲入龍虎山學道。初師李宗老，後從雷空山習易經老子。（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五，河圖仙壇之碑。簡稱壇碑。）⁵

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三十七歲

吳全節十六歲，受度爲道士。（壇碑。）

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三十八歲

‘擢公商議集賢事。初集賢翰林共一院。用公奏，始分翰林掌詔誥國史，集賢館天下賢士，以領道教。置道官及道觀，主者多給印，視五品。爲其道者復徭役。’按此趙著張碑所記，未詳年份。元史百官志（卷八七）集賢院條則詳記：‘秩從二品，掌提舉學校，徵求隱逸，召集賢官。凡國子監、玄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隸焉。國初集賢與翰林國史院同一官署，至元二十二年分置二院。’

‘二十二年仁宗生，復召命名。今二帝（按係武宗仁宗。）廟諱，雖用國語，皆以公名義釋之。’（袁著張傳）

4 按此事也可能在至元二十五年發生，因元史新元史列傳都聯書‘十八年 二十五年。’今只根據‘嘗命’二字，排在前一年份，理由是相當薄弱的。又新元史對於玉印的來源有一個糾正：‘其實天師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君所”，乃宋徽宗所賜，非漢印也。’

5 雷空山字齊賢，‘著書曰：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所爲詩文二十卷、和陶詩三卷。齊賢名思齊，家世臨川人。幼棄家，居烏石館。晚講授廣信山中。暨終也，復歸烏石。……卒時年七十有二。’（袁樞：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一，空山雷道士墓誌銘。）

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三十九歲

許有壬生（一二八六——三六四）年七十八。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四十歲

公召吳全節北上，時全節年十九歲，得隨見世祖。按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二，吳公行述作‘年二十’。

是年元廷遣使持香幣詣龍虎、閣皂、三茅設醮，召天師張宗演赴闕。按孫今生教授解釋‘是年召天師入京，吳當隨天師北上。’（孫著元道教，頁一八〇。）這個推論是對的。

是年世祖用程鉅夫言，召見趙孟頫，以為兵部郎中。

行至元鈔。

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四十一歲。

‘二十五年預議集賢院，賜七寶冠、金錦衣、玉佩珠履。’（袁著張傳）

天師張宗演入覲。

二十五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因小演赤奏：曩者所燬道家偽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燬，其書皆詆毀釋教之言，宜甄別。于是命前中書右丞張文謙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偕宗演等證辨真偽，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為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等偽作。文謙等奏：自道德經外宜悉燬。帝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以是端試之。不驗，焚之未晚也。遂諭宗演等、俾推擇人入火試其術。宗演等奏：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皆為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偽書，庶幾深雪臣等。帝可其奏。遂詔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一切焚燬。匿藏者罪之。十月，集百官于愍忠寺，焚燬老子化胡、猶龍傳等書。（新元史張傳。）這是關於‘至元辨偽’一節具有代表性的描寫。焚燒道書之舉，到張留孫的密諫發生效力，方始停止。參閱至元十六年條。

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四十二歲。

江南初定，公奉詔代祀南嶽，吳全節隨行。（許有壬：至正集，特進大宗師閑閑吳公挽詩序。簡稱挽詩序。壇碑同。）按元據中國北部，已祀四嶽，至是始得祀南嶽。

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四十四歲。

‘正月癸卯，命玄教宗師張留孫置醮祠星。二月丁卯，詔加嶽瀆四海封號，各建宮詣祠致告。’（世祖本紀）

吳全節隨行，遍祠嶽漢諸山川。孫今生教授云：‘據壇碑挽詩序稱：“神德（錄按：神德，張留孫封號。）代祠嶽瀆，公（錄按：指吳全節。）實輔行，年二十二，聲望赫赫矣。”依壇碑，祀嶽在廿八年，吳氏應為廿三歲。’（孫著元道教，頁一八。）

是年丞相桑歌敗，‘上（世祖）將相完澤，命公以易筮，遇“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中而應乎乾，豫利建侯；象為君臣咸吉。誠相完澤，天下幸甚。”明日，拜完澤右丞相。’（趙著張碑。）‘後卒受遺輔政。’（袁著張傳。）

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四十五歲。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上問“果便利？”（張留孫）對曰：“漕為國本，孰敢議非是？誠減民力，取實效，民心趨之。”由是河役卒不為民病。’（袁著張傳。）「大臣聞公（張留孫）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為民先。’（虞著張誌。）⁶

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四十七歲。

‘上（世祖）不豫，諭隆福宮曰：“張上卿事朕歲久，始終一德。宜令諸皇孫尊信其道。”又諭公善事嗣皇帝云。’（趙著張碑。）

世祖崩，成宗歸自朔漠。‘隆福太后遣重臣從公郊迎。行至，公下馬立道左。上令就騎，且語之曰：“卿家老君猶爾睡耶？”……公對曰：“老君今當覺矣。”上悅。’（同上）

吳全節隨張氏出迎，由是亦大得成宗信任。

三十七代天師張與棣（宗演子）入覲，卒于京師。（元史張傳）

‘當至元末年，成宗新嗣位。時宰不快于御史臺，成宗是其言，讓責中丞崔公彧。（按元史有傳，卷一七三。）崔懼，問策安在？（張留孫）曰：“當見丞相釋所以。”遂與俱詣相府，相怒霽。又與同謁近臣，言“御史臺，世祖皇帝建立，專以懲姦慝。勢尊則綱紀明；削之，則臺不能立矣。”近臣大驚，入言于上。明日大宴大明殿，諭崔曰：“臺爲朕耳目，朕曷不知？憂卿等不識，故告諭，宜勿懼，其盡心焉。朕行爲汝增重矣。”崔頓首拜手謝。其彌縫國體，婉順若是。’（袁著張傳。）’

成宗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四十八歲。

‘詔公同知集賢院道教事。’（袁著張傳）按新元史謂：「大德中。」（卷二百四十三，列傳第一百四十，釋老，新元史本傳。）

升江南諸縣爲州。

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四十九歲。

‘明年（按謂元貞元年拓建崇真宮工訖之‘明年’。）有星孛于正北，詔公禱之。奏曰：“臣聞人事失于下，則災異見于上。願陛下省躬修德，以祈天也。”上曰：“卿戒甚至，朕不敢忽。”’（趙著張碑）

大德三年（一二九九）五十二歲。

‘上嘗御便殿，命公進講南華經。公推廣成子語黃帝之說。上感歎，加特賜上卿玄教大宗師，別給銀印，視二品。’（趙著張碑）

大德四年（一三〇〇）五十三歲。

‘四年，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于崇真宮，設醮慶成。上齋而臨幸，賜開府（張留孫）及公（吳全節）黃金白金重幣有差。’（壇碑）

公弟子夏文泳至京師。‘公（夏文泳）素清慎博雅，爲開府公（張留孫）所賞識……與大宗師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同侍開府公左右。’（黃著夏碑。）

6 ‘通惠河其原出于白浮龜山諸泉水也。（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十步……以通漕運，誠爲便益。”從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元史河渠志一，通惠河。）

7 虞集御史臺記：‘……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按爲公元一二七〇），始立御史臺……’（虞集）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西行臺……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今天下凡二十二道……’（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二。）

大德五年（一三〇一）五十四歲。

召見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與棟弟）于上都幄殿。（元史張傳）

袁桷進郊祀十議。（新元史卷一八九，列傳第八十六，袁桷傳。）

次年，虞集授大都路儒學教授。

大德七年（一三〇三）五十六歲。

‘七年上京旱，兩京山西地震。復命祠祝。（張留孫）謝曰：“祠祝實臣職，祭不欲數。地道主靜，厥罰惟陽，見于五行，傳災由人，輿願應天，以實布德，賑惠。臣敢稽首以請。”上深領之。’（袁著張傳。）

大德八年（一三〇四）五十七歲。

成宗御玉德殿，以張氏生日，賜玉冠、上尊、良馬。（趙著張碑，袁著張傳。）

授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為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錄。（元史張傳。）

大德十年（一三〇六）五十九歲。

大德‘十年，制授上卿。’（袁著張傳）按元世祖于至元十四、五年間已授孫氏以上卿之號，兩元史本傳及虞著張志，袁著張傳，趙著張碑均有記載。何以重授？或袁氏誤複？待考。

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六十歲。

是年成宗崩，武宗立，未改元。

‘武宗踐阼，陞公大真人，知集賢院，領諸路道教事’（趙著張碑。）

制授吳全節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印，視二品。（壇碑）

武宗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六十二歲。

公領集賢院，位大學士上，是歲再加特進。（袁著張傳。）

制授夏文泳為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品。（壇碑）。⁸行至大銀鈔，始鑄錢。

仁宗皇慶元年（一三一二）六十五歲。

‘錫號輔成贊化’（袁著張傳。）

皇慶二年（一三一三）六十六歲。

仁宗‘召公論道。公曰：“聖人至德，體保清靜，則永壽萬年，庶類以成，而天下自治。”……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勅將作院刻玉為印，文曰：“玄教大宗師印”，以賜公。’（趙著張碑。）

二年，命將作臣製玉刻文曰：“玄教大宗師”。手授曰：“以是傳教俾永遠。”（袁著張傳。）初行科舉。

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六十八歲。

‘上（仁宗）御嘉禧殿，謂宰臣曰：“知朕有耆德之臣乎？張上卿是也。”……明日，加開府儀同三司。’（趙著張碑。）按袁著張傳，虞著張誌均記本年‘號加保運’，正確的。趙碑不記年，故連類而及耳。

許有壬進士及第，授同知遼州事。

8 夏文泳晉升很快，後來繼吳全節為玄教第三代大宗師。其第四代大宗師是張德隆，是張留孫的姪兒兼弟子。玄教傳授，到張德隆就停止了。

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六十九歲。

郭守敬卒（一二三一——一三一六）

趙孟頫奉旨撰書真定路（河北省保定正定大名一帶。）隆興寺金剛上師膽巴之牌。（作者現藏此帖，參看18頁小照第4號。）按膽巴係帝師巴思八（或作八思巴）之昆弟子。至元七年與帝師俱至中國，為隆興寺住持。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卒于上都。二人，元史，新元史列傳釋老均有傳。

延祐四年（一三一七）七十歲。

賜宴崇真宮，朝臣咸與。詔圖公像，命趙孟頫贊而書之。⁹公乞歸，不許。

天師張與材子嗣成‘嗣為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錄如故。’（元史張傳。）按本條或隸三年十二月。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七十三歲。

正月仁宗崩。七月公受命修醮事于崇真宮。

英宗至治元年（一三二七）七十四歲。

十二月卒于京師崇真宮，舉朝會弔。¹⁰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公焚香室中，召諸弟子曰：‘吾教以清淨無為為本，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其宗旨也。今玄教特被寵遇，五朝四十七年，爾徒見其盛也。其亦知吾之戰戰慄慄，至于今，而後知其免夫？尚思恪恭乃事，以報稱朝廷，毋墜成規，則吾志也。’言畢，端坐而逝，壽七十四。’（趙著張碑。）

袁桷遷侍講學士。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卒于家，年六十二歲。新元史作五十四歲（？）。

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命趙孟頫撰開府銘文書刻。又命吳全節襲玄教大宗師，予告歸治喪。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奉旨葬張留孫於龍虎山南山之月嶠。明宗天曆二年（一三二九）詔封張留孫為神德真君，奉祀于龍虎山神德宮。先是，延祐中‘張留孫買地於大都（北平）齊化門外，規以為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沒。至治二年，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三，東嶽仁聖宮碑。）天曆二年，並立趙著張碑於廟內。

吳全節于元順帝至正六年（一三四六）也在大都崇真萬壽宮逝世，而‘殯于嶽祠光岳堂’（挽詩序）。于此，也可見孫吳二氏與北平東嶽廟關係的密切。”

9 趙孟頫張公畫像贊曰：道德之全，玄之又玄。時而出之，溥溥淵泉。其動也天游，其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謂我貴，而我不敢為天下先。贊化育而（按松雪齋集而作以。）不居，寶慈儉以乾乾。故位三公，揖萬乘，獨立乎方之外，而坐閱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頌，承命自天。穆如清風，萬古其傳。（趙著張碑及松雪齋集卷十。）

10 新元史云「卒年四十七」當係「七十四」之倒植。記待校印者注意。

11 吳全節歷事元代十主五十餘年（袁國藩先生玄教考卷五。），不但活躍于道門政壇，且常與文人學士周旋。孫今生先生已錄詩數首為例（元道教頁二三一至二三二）。今併錄我僅見一文于下。吳全節跋趙孟頫書孝經卷：‘趙魏公宋藝祖子祖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傳，實生孝宗，始賜第居湖州，故為湖州人。至元間，治書侍御史程鉅夫奉詔訪江南遺逸，得二十餘人。獨公入見，世祖稱為神仙中人。仁宗眷重，字而不名。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贈江南浙行省平章事、封魏國公、諡文敏。榮際五朝，名滿天下。書法二王，畫師晉唐，俱入神品。其在鵝波亭，嘗臨李伯時孝經一卷。當時之人，求之罕得；得之者如獲至寶，人以重價購之。此卷其尤妙者也。其入伯時闕與不遠矣。今獲見之于玉山草堂。主人求題，因書公出處大畧于後。君其寶藏之。看雲道人吳全節書。’（故宮書畫錄卷四，頁一一一至一一二。）

元玄教宗師張留孫年表提要

兩元史記道教，都標舉邱處機孫留孫二人。到了現在，邱處機還有人提起，多半是因為世俗已把他的遊記西遊記與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混作一談了。張留孫則乾脆被人遺忘。其實柯劭忞評二人，却說元世祖對張留孫‘恩寵尤渥’，用側重的語氣。袁桷更謂張留孫‘視陶弘景葉法靜殆將過之’。這自然是因為張留孫兩次挽救道教滅亡的危機，又能進‘黃老之言治國家’，歷五朝四十七年之久，厥功甚偉，是史家應該大書特書的人物。

張留孫死後，趙孟頫奉勅撰書碑銘。茲覓得完整拓片兩大張，洵海外孤本，不易多得。併刊公世。

A Chronology of Chang Liu-suen, the Founder of the Hsüan chiao 玄教, A New Taoist Sect of the Yuan Dynasty

Chang Liu-suen (1247-1321) was one of the two prominent Taoist priests in the Yuan Dynasty (1277-1367). This is a considered opinion shared by the authors of both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New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Ke Shaw-min (柯劭忞), the author of the *New History* even hinted that Chang Liu-sue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Chiu Ch'u-chi (邱處機, A. D. 1148-1227), the other prominent Taoist priest immediately preceding Chang. Yuan Chüeh (袁桷), a contemporary and friend of Chang went even further to say that Chang "with his wonderfully pure character stood out noticeably from the common people (清奇絕俗) and almost surpassed such great personages in the history of Taoism as Tao Hung-ching (陶弘景, A. D. 451-536) and Yeh Fah-tsing (葉法靜, A. D. 616-720)." But today very few people know who Chang Liu-suen wa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Taoism, the present study is an attempt to rediscover Chang Liu-suen, the man and his life. In order to be exact and detailed, the deeds and preceptive words of Chang Liu-suen are recorded in this article year by year.

The turning point in Chang Liu-suen's illustrious life came in 1276 when, at the age of 29, he left the Dragon-Tiger Mountain, the Taoist "Vatican" in Kiangsi Province, and went to Peking with his leader, Chang Tsung-yen (張宗演), then the Taoist Pope, to answer a summons to the court by the new Mongol Emperor, Kublai Khan (1214-1294). During the interview the young Taois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Kublia Khan and was kept in the Court while the Taoist Pope went home. During his forty-seven years of public service in the Court of five successive Mongol Emperors Chang Liu-suen made valu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realm of both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Chang was great in the area of religion because he twice saved the Taoist religion from being crushed. The first instance was when he persuaded Kublai Khan not to destroy the hereditary system of the Taoist Papacy, which was founded by the first Taoist Pope, Chang (Tao)Ling (張(道)陵, A. D. 34-156) in the Han Dynasty (206 B. C.-219 A. D.). At the same time he declined his appointment as a new Taoist Pope in place of his leader, Chang Tsung-yen. The second instance was in the 1280's when he persuaded the Crown Prince, Prince Yu, to ask Kublai Khan to withdraw the order to burn the Taoist books which are the life-source of the Taoist Religion.

During the reigns of four succeeding emperors, Chang Liu:suen devoted his time to reviving the Taoist religion. He preached and expounded Taoist teachings to the emperors and high officials, and performed Taoist masses in the palace and in the temple especially built for him. The result was that in spite of attacks by the Buddhists, more sets of the Taoist classics (道藏) were installed in the Taoist temples and more Taoist paper chamrs were accepted by the people

Five reasons for the greatness of Chang Liu-suen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may be mentioned. First, he protecte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especially the Chinese scholars from being mistreated by the Mongolians, even recommending various scholars for posts in the Mongol Court. Second, he caused the Han-lin (翰林, Literary) and Tsi-hsien (集賢, Religious) academy to be separated into two independent academies. Third, he helped maintain the prestige of the Yu-shih Tai (御史臺) which w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ensor's Office and is still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present "five-power government." Fourth, he supported the famous engineer, Kuo Shou-ching (郭守敬, 1231-1316) in his daring project of opening up the Tung-hui Canal (通惠河) which connected Peking to Tung-chow where the Grand Canal ended. Fifth, he assisted Kublai Khan in making the important decision to appoint as premier Wan Che (完澤; 新譯, 諤勒哲), whose loyalty and wisdom was fully proved when he assisted the young emperor to rule the country after the death of Kublai Khan.

Because of his recognized ability, loyalty, and the meritorious achievements, Chang Liu-suen was made the Supreme Minister (上卿), the head of the new Taoist Hsüan Chiao (玄教宗師), the president of the Tsi-hsien Academy, and the Supreme premier (特進) by Kublai Khan and the succeeding emperors.

The famous artist and scholar Chao Meng-fu (趙孟頫, 1254-1322) at the order of the emperor, composed a biography of Chang Liu-suen and copied it his own distinctive style. A photo-copy of the rare rubbings of the tablet is attached to this article.